

大河之北

(上接第十版)

“三岔口”只是个“小课题”。1981年,苏秉琦在探索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上,提出了更为宏大的课题:《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》。

文中,苏秉琦将中国人口分布稠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:

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,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,以关中(陕西)、晋南、豫西为中心的中原,以环太湖为中心的南部,以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,以鄱阳湖—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。

“它不单单是一个考古学理论学说,而且关系中华民族的起源,是在探索怎样从精神上十几亿中国人,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。”蔚州博物馆馆长李新威说。

河北的考古学研究,因此被放到了更大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框架内。

李新威展开一张蔚县地图,直指穿县境而过的北纬40度线。

苏秉琦所指的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“燕山南北长城地带”,正是以北纬40度线为轴线南北铺开。

蔚县,北纬39度33分到40度12分,成了这一区域考古工作的突破口。

很快,考古队就在包括蔚县三关遗址在内的多个遗址,发现了北方文化因素和中原文化因素共存的器物例证。接着,在辽西和内蒙古东南地区,发现了红山文化等多支从史前到商周前的古文化。

苏秉琦将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状态形



磁山遗址粮食窖穴灰坑。磁山文化博物馆供图

容为“满天星斗”,认为多元的文化通过“裂变”“碰撞”“融合”等多种形式,汇聚成后来的中华文明。

“满天星斗”说,也给河北文化带来新的解读方式。

依据“满天星斗”说,回看整个河北新石器时代的时空、文化分布,南北文化并蒂开花,复杂、多元的文化次第闪耀,交流融合,这才成就了今天文化有如“万花筒”般绚烂的河北。

河北,正是苏秉琦“满天星斗”说最典型的地域样本和考古缩影。

考古见证的文明

农业:文明的先声

2020年6月24日,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。

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、磁山遗址发掘报告撰写人之一高建强打开保管箱,小心翼翼拿出两件器物——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。

记者接过石磨盘掂一掂,沉甸甸的。摸摸,表面有明显的磨砂感。

石磨盘和石磨棒,是磁山遗址最早的考古线索。

1972年初冬,武安城南16公里,南洛河北岸的滨河台地上,磁山第二生产大队(今磁山二街)在开挖水利沟渠。

“谁认识这是啥?”一块鞋底形状的石板被铁锹挖了出来,大约50厘米长,25厘米宽,一面还有四个2厘米高的短腿儿。

“还有呢!”接着,队员们又挖出一根石棒,大约30厘米长,中间粗两头细,最粗的地方直径大约4厘米。

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当时的省文物管理处(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),出土器物被收存上来,磁山考古就此拉开序幕。

这外观奇特的石器,怎么确定是磨盘和磨棒呢?

高建强让记者靠近了仔细看。

“看石板没腿儿的一面,还有石棒这个侧面,有反复摩擦的痕迹,很可能是粮食脱粒工具。”他把石棒放在石板上,向前平推碾磨,示范当时给粮食脱粒的过程。

磁山遗址最终出土了一百多组石磨盘、石磨棒,数量惊人。

粮食脱粒工具多,储粮的窖穴和粮食也多。磁山遗址第一次发掘共发掘灰坑468个,其中88个长方形的窖穴底部堆积有灰化粮食,层厚0.3米至2米,其中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在2米以上。

“窖穴分布范围之广,密度之大,数量之多,在当时新石器遗址中是不多见的。部分粮食刚出土时,一粒一粒黏在一起,还能看得很清楚。”乔登云说。

这是什么粮食?

武安小米,是武安优势主导农产品,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“地理保护标志产品”。武安市年种植谷子面积近30万亩,产值超过7亿元。

这片土地,其实早在8000年前后,就适宜谷子

生长。在磁山遗址窖穴中,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黏在一起的粒状物,经鉴定是粟(俗称谷子)。

“磁山人在采集野生‘狗尾草’过程中,逐渐掌握了它的生长规律,经过无数次选育、栽培的实践,驯化成粟,栽培种植。”乔登云说。

在此之前,农业史学界普遍认为粟起源于埃及、印度。磁山遗址粟的出土,把我国黄河流域植粟记录提前到距今8000多年,也修正了世界对人类植粟年代、源地的认识。

磁山遗址出土的器物,70%以上是农耕和脱粒工具,加上众多的窖穴和灰化的粟,说明磁山原始农业已经有很大发展。

磁山人不仅驯化了野生植物狗尾草,也驯化了野生动物,比如野猪。

“通过对磁山遗址上百块猪骨的DNA检测研究,我们最终确认磁山遗址为中国北方家猪的起源地。”

2012年11月22日,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,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赵兴波,发表了对磁山出土猪骨的研究成果。

此前,磁山遗址出土的猪骨,是野猪还是家猪的,一直悬而未决。

古生物实验中,判定野猪、家猪主要有两个标准,牙齿长度、死亡年龄。

“磁山遗址中,猪的下第3臼齿的平均长度为41.4毫米。普通家猪为40毫米以下,已经很接近。”赵兴波在报告中阐明,磁山遗址超过60%的猪在0.5到1岁时就被宰杀,这种死亡年龄结构不像是狩猎的结果,而是人为控制。

“家庭饲养业的出现,是以有剩余粮食为前提的,并有粮食贮藏,饲养数量不多的家猪和其他家畜是可以实现的。”乔登云说。

这再次说明,磁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水平。

磁山遗址的发现,把中国北方的农业文明带到了新的高度。

制陶:土与火的交融

在河北博物院“石器时代”展厅,“旧石器时代”向“新石器时代”主题的过渡展区,有一张照片。

照片上,是一块出土于阳原于家沟遗址的陶器残片,黄褐色,巴掌大小。专家推测,这是一件陶器的底部,当时的烧制温度大约为800℃。

这是中国北方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陶器残片,距今11000年。

制陶技术,起源于中国,是与农业、磨制石器比肩的人类史前时代的创造。

2020年7月20日,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。

“外壁这一圈圈的浅棱,其实是一圈圈搓好的泥条摆在一起留下的。”乔登云指着架子上的一件



磁山遗址出土的先民粮食脱粒工具石磨盘、石磨棒。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



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制直筒盆和支架。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

小口壶,示意记者摸摸看。

这是最原始的陶器制法之一——泥条盘筑。之后,制陶经历了慢轮修坯成型、快轮拉坯成型的技术升级。

陶器不仅有棱,而且磨手,这是因为其中夹杂了砂砾。

夹砂陶,是河北新石器早期陶器主要的一类。“夹砂陶的原料是没经过淘洗的黏土,且掺入砂粒,虽杂质较多,质地粗糙,耐高温,有韧性。距今大概6000年左右,根据需要人们还学会了淘洗,出现了杂质更少或光洁、吸水性小的泥制陶、细泥陶。”乔登云说。

陶器的变化较快,地方特征也比较显著,所以考古工作中一般把陶器作为识别“文化”,区别“类型”,划分“时期”的重要依据。

给陶器分型、分式,是乔登云和高建强撰写磁山遗址考古报告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。

“谁和谁长得像,可能是一家人,谁是爷爷,谁是爸爸,谁是儿子,我们要通过观察,对比,给陶器分堆儿,排队。”高建强说。

一类最具代表性的陶器——磁山人用的“锅”,他们就是通过分型、分式,找出了五六百年里演变的规律。

磁山人的“锅”,是复合炊具。上面的“孟”,是圆筒形陶罐,相当于锅,下面的三个分体支脚,相当于锅架。

单看一个支脚,不稀奇,但这类复合炊具在出土陶器中占了七成,放在一起对比,差别就出现了——越晚的地层出土的支脚,顶面越窄,与锅的接触面越小。

“支脚顶端缩小,锅底儿受热面积增大,这就提高了煮饭效率。”乔登云说。

这看似并不显著的变化,正是一代代先民经验的积累,集体智慧的凝聚。从这细微的演化中,我们看到的就是文明发展的具体印记。

这种复合炊具,此后并未消失,在年代晚于磁山的遗址中,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它的“进化”版。

正定南杨庄遗址考古中就发现了和磁山遗址带支脚直腹盆很像的“锅”。

只是锅从平底儿演变成圆底儿,支脚为了贴锅壁,演变成马蹄形弯把儿。

圆底儿锅和弯把儿支脚合体,就是后来的“鼎”。南杨庄遗址,是河北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址之一,还出土了泥质敞口红顶钵、彩陶钵、敞口红顶碗……

看过磁山遗址陶器的“素颜朝天”,再看这些有黑色、红色彩纹饰的陶器,让人眼前一亮。

彩陶出现,是仰韶文化的显著特点。河北彩陶,出土数量较多的,有正定南杨庄、永年石北口、曲阳钓鱼台遗址等。

由于河北没处在仰韶文化核心区,因此彩陶数量较少,纹饰简单,颜色以红彩、黑彩为主,往往绘在陶器腹部或口沿上。

陶器上最多见的纹饰,是竖线组成的平行线纹、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空心三角纹,其次是斜线组成的交叉网状纹,或者仅在器口涂一道或几道宽带状纹。

河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,绝大部分是生活用具,器型有孟、钵、壶、罐、鼎等,功能分为炊具、盛

储器和汲水器,不过通常一器多用。

这些陶器是在哪里烧制的?

河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,都未发现陶窑。考古专家推测,当时陶器烧制一是采取露天形式,即把手工制作成型的陶坯放入火堆中,几个小时,陶坯变硬,就成了陶器,但火候相对较低。

二是采用平地封护形式,即将适量的木材等燃料与器物陶坯堆放在平地上,四周用木棍等支撑为伞状,其上覆盖树木枝条、苇箔或草席,并用草拌泥将其封严,仅留点火孔和烟孔,当大量燃料全部燃尽,陶器即已烧制成功。

河北迄今发现最早的陶窑,出自邯郸磁县下潘汪遗址,属仰韶文化时期,距今约6500多年。尤其磁县南城遗址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群,距今约4500年。

“当时的陶窑都是窑室在后上方,火膛设在窑室的前下方,窑床上开有树枝状火道,烟火通过火道进入窑室,陶器烧成温度能达到1000℃以上。”乔登云说。

在磁山下七垣遗址(距今4000年—3600年),考古工作者发现,陶窑结构升级了。

火膛改建到窑室正下方,这一改良,将窑室加热温度提高到1100℃。

这个温度,已经接近陶与瓷的临界温度,为河北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

居所:从生到死的庇护

在河北博物院“石器时代的河北”展厅,有一座房屋模型。

房子地基近正方形,圆角,南北长3.9米,东西宽3.85米,屋内地面在地平面下0.5米深,地面烧成红褐色硬土。屋子中央垒石支灶,灶旁小坑堆柴灰。

门在北面,有一坡道通向地面,房子主体框架由墙四壁内置的13根木柱支起。

建造这座房子的,是一户生活在易县北福地的先民,他们还有11户邻居,距今7000年—8000年前他们一起居住在易水河畔的台地上。

这是迄今河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。它们分布密集却不零乱,甚至有些“村庄规划”的味道,被称为“燕赵史前村”。

和居住遗址一样,墓葬也是考古要寻找的一类遗址要件。

2020年9月5日,张家口阳原县西水地村东,姜家梁遗址。

“就是在这里,我省发现并发掘了第一座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。”成胜泉绕到遗址碑后面,指着土梁上一块长条形土坑说。

遗址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,1998年发掘后已经回填,荒草下隐约还能看到考古探坑的轮廓。

1995年,1998年,姜家梁墓地分两次发掘,共发现距今5000年的墓葬117座。

遗址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墓和洞式墓两类。整个墓区除两座为仰身直肢外,其余皆为仰身屈肢葬。以单人葬为主,也有双人葬和多人葬,最多的墓穴葬有五人。

“墓葬文化面貌具有浓郁的北方文化特色,年代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。”成胜泉说。

1998年,姜家梁墓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。

但如此大型的墓地,埋葬的究竟是何人,还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考古发现,常伴随新的未解之谜,对远古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更是如此。

在河北博物院的展柜中,有一个人脸形状的方形陶面具。

面具由碎成的六大片拼成,面部上宽下窄,鼻子、嘴是浅浮雕,两只眼睛是透雕,面具的四角,有四个小穿孔。

面具雕刻技法上,平刻、阴刻、镂空相结合,把写实性、象征性、装饰性融为一体。

这件陶面具,就出土于易县北福地遗址,距今已有7000年—8000年。

遗址共出土了10多件陶面具,形制有大有小,大的有真人面部大,小的只有10厘米见方。

这是目前我国年代最早、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,不仅把中国的雕刻艺术向史前推进了几千年,还为研究史前宗教、巫术提供了资料。

陶面具,显然不是一件生活用品,应该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

考古工作者推测,它们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或巫术的辅助用具,由祭祀者或巫师使用。

源流篇(上)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



河北博物院展示的北福地遗址先民建造的半地穴式房屋复原样式。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